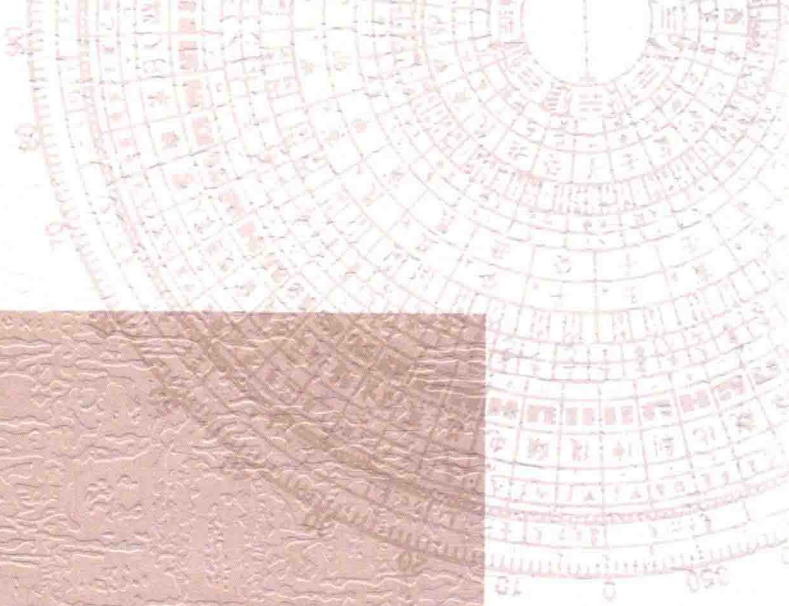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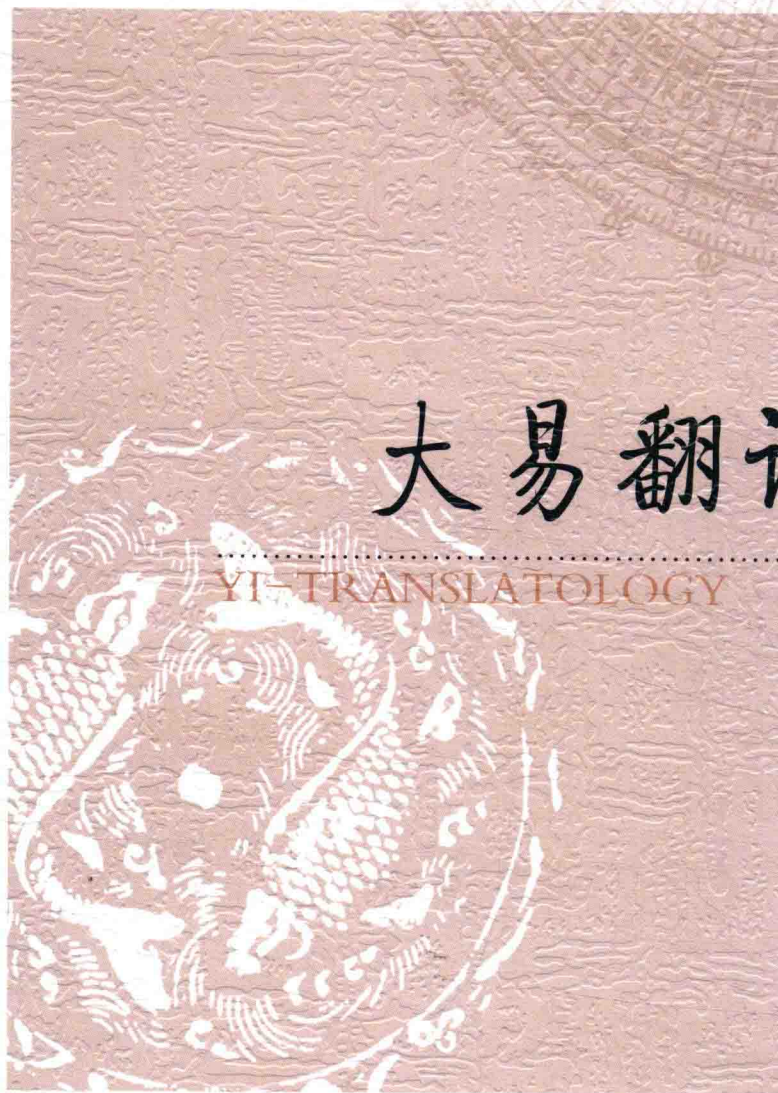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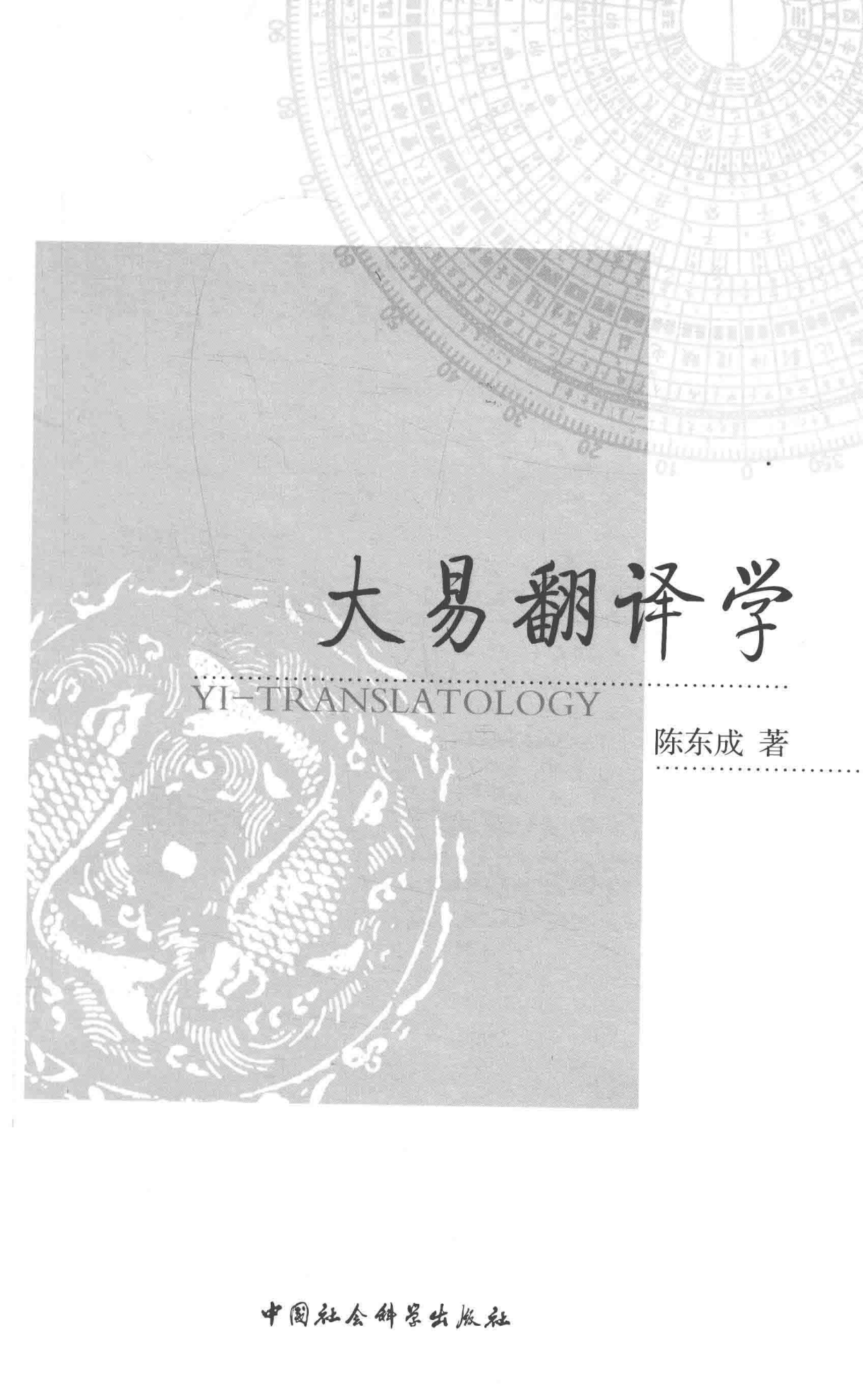
大易翻译学

YI-TRANSLATOLOGY

陈东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大易翻译学

YI-TRANSLATOLOGY

陈东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易翻译学 / 陈东成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
(2017. 6 重印)

ISBN 978 - 7 - 5161 - 7618 - 4

I. ①大… II. ①陈… III. ①《周易》—翻译理论
IV. ①B22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89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此书为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大易翻译学：译学的大易视角研究”
(批准号：2013WXYM0104)的最终研究成果

谨以此书献给
我敬爱的父母亲
陈行光先生
余莲宝女士

学者点评

(以姓氏拼音为序)

《大易翻译学》以易治译，以易弘译，是译学中一大创新型研究成果。陈君如能以易学为体、译学为用，并双向发挥，必然在两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成就。有关易学方面，“三易”之说必须扩展为“五易”之说，方能彰显译学中意义交换及视野融和的目标，是以为勉。

——国际易经学会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成中英

译学界给翻译的定义林林总总，但是就其凝炼与精当而言，首推《大易翻译学》的表述：生生之谓译；就像翻译标准各说纷纭，人们还是普遍信奉“信达雅”三字一样。我国传统哲学强调“生生”为宇宙的根本原理，认为“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讨论翻译，或可把上述名言改为：“二语交际，化生翻译，译文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里，二语指两种不同的语言。用两种语言交际就产生翻译，译语生生不息，译事、译理、译史延绵发展。《大易翻译学》的作者传承国粹，以易治译。这是难得的既弘易又弘道的译学新论。

——《上海翻译》主编、上海大学教授方梦之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中国文化与智慧之宝库。《大易翻译学》蹊径独辟，以《周易》的“道”“理”阐释现代译学，展示了译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拓宽了译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澳门理工学院教授蒋晓华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陈东成教授学贯中西，精思深研《周易》与翻译学，尝试结合二者，构建会通体系，完成《大易翻译学》杰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来鸿

2 大易翻译学

邀请赐言，与有荣焉。特赋《东成教授大易翻译学赞》排律一首，祝贺学志圆成，更上层楼！

东西道理古今同，
成就名山德业隆。
教艺相长时损益，
授研互惠岁枯荣；
大家切磋琢磨久，
易传思量斟酌重；
翻典圆神玄妙巧，
译文信达雅恢宏；
学无止境勤为岸，
赞美三才仰圣功。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赖贵三

《大易翻译学》出入中西，归本大易，推陈出新。展卷读之，便觉别有风味，耳目一新，遂作《东成大易翻译学好》诗一首以赞之。

东西南北你也她，
成功酿蜜笔生花。
大作宏辉争祥报，
易苑精髓喜上嘉。
翻阅典章添新页，
译带一路通天塔。
学研创新宜自觉，
好生庄重颂中华！

——《中国科技翻译》主编、中国科学院教授李亚舒

融合中西文化，体悟先圣之意，建构大易翻译学，转换话语系统，再显大易精义，立成器为天下利。

——《周易研究》副主编、山东大学教授林忠军

《周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座高不可攀的巅峰，令凡人却步，引智者痴迷。东成教授显然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用中国哲学来论中国译学之事，上接天理，下接地气，理论与实践无缝对接。他的这部《大易翻译学》是一部难得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

——中山大学教授王东风

本书作者立足《周易》所承载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援易入译”，系统阐释当代翻译学的新话题。其价值性、合理性及科学性如何，读者自有思考与判断，但作者坚持探索，孜孜于“易”与“译”的研究，这是极其值得肯定与支持的。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谭载喜

序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周易》对自身和人类一切知识体系的高度概括。可是人类失之于道已久，诚如《论语》所言：“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当今的知识追索要么是本末倒置，要么迷失于细枝末叶，有些令人无奈。复归于道，似乎是痴人说梦。然而，有人却在默默地践行。翻译，在很多人看来算不得什么学问，而在我看来它却是通向所有知识领域的大学之道。有哪门学科像翻译学这样包含更多的真理与悖论，需要研究者抛洒更多的热情，也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理性与辩证？如果没有道的引领，其结果必然是混乱而低劣的——理论与实践皆如此。我在讲座中回顾经典翻译的质量问题时曾断言以往的译作百分之九十九不合格，听者可能会觉得我故作惊人之语，其实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真话。如果没有道的关照或者我们崩解了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张力，不谙哲学、文学之要义，情况也只能如此。我之所以还保留百分之一，这大概是由于潜意识中的客气吧。

撰写《翻译学归结论》时，我心目中的框架就是《周易》。归结何处？归结于道；翻译的系统是什么？就是易。但我并没以《周易》作为翻译学的构架。那时人们大多觉得《周易》太玄，而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对《周易》认识还很浅，不敢贸然采用。

十年后我有幸受陈东成先生信赖，为其新著《大易翻译学》作序。由于对《周易》还没精研，我真觉得无能为力。但陈先生如此诚挚，我实在无法婉拒。好在我对《周易》也是一片痴情，权作是一个学习机会，说几点自己的感受吧。

在知识爆炸的当下，翻译是不乏理论的，但纵观形形色色的理论，由于没有形而上的关照，其认识是极其庞杂而肤浅的，甚至有的理论其精神竟是颠覆翻译的本原、本质而借翻译理论之名行解构翻译理论之实，于是

“作者死了”，而传统的准则比如忠实、对等，乃至文本本身都被解构了。翻译成了是其所非的荒谬和无所不是的弥散。

《大易翻译学》是一次反动，是将翻译拉回正轨的企图，而且它多向度地向前掘进了。

通读《大易翻译学》是一次愉快的学术旅程。

该书以《周易》为哲学依据，系统地探索翻译的本原、本质、原理与方法，进而朝外在的成分扩展，它力图建构的是翻译学全域与局域相照应的理论体系。

它引贾公彦之言：“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译乃是大学之道，只是相对于“易”，其所谓的“译”是译理在翻译中的体现。一切的“译”均可以以“易”为关照，比如翻译本质“交易论”、“太和”翻译标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阴化、阳化”翻译策略、“阴译、阳译”翻译方法、“生生为美”的翻译审美观、“利以合义”的翻译伦理观、“保合太和”的翻译生态环境观，等等，无不蕴含简明而深刻的易理。

该书中“译”与“易”的结合是全域的、系统的，它细化易理作为哲学依据来阐释和推演出翻译的要旨。它从《周易》中的“生生之谓易”推演出“生生之谓译”，认为译作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的再生，即原作与译作不是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关系，体现着《周易》里所谓的阴阳关系：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互存互生。翻译之所以是“文化交易”，是因为翻译是原文信息在异域文化中的再传播，与其说是语言的转换，不如说是文化的易位，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对话，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这两个体系的交际、合作或交融。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犹如阴阳两种力量，两者相遇、相摩、相荡、相融后便产生文化交易。显然，这种译理的解释超越了传统译论的忠实、对等，也避开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操控论、改写论，它以翻译为本由此也就确立了译者独立的学术地位。

该书进而以“易”的“简易”、“变易”、“不易”推演出“译”的“简易”、“变易”、“不易”，并指出“译”与“易”相通。不难发现，这是很合理的定位和解释。它从宏观的视角探讨翻译原则，得出这样的断言：一是求同存异，二是守经达权。“易之三义”即简易、变易、不易在翻译中得到全面的体现。“不易”是体，“变易”是相，“简易”是用。

如果我们把“易”与“不易”看作两极，则翻译处于“易”与“不易”的张力之中。“不易”是“常道”，它不局限于具体的语言，是最高位的抽象，人们称之为“经”；“易”则表现在“通权达变”上。在具体的层面翻译可以无处不变，但所有的变又都是受制约的，这一性状可以看作翻译的本质。“求同存异、守经达权”是依据《周易》哲学进行的高度提炼，是从新的视角切入进行的研究，而且也以中外权威译论加以佐证，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对译者和译论研究者自然也有所裨益。

“易”是“译”的本体论定位，但是如果不设定翻译标准或勾勒出翻译策略，翻译也便没有可操作性了。该书以“太和”为翻译标准，并探讨其特性和实现途径，即“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太和”翻译标准是《周易》中“和”、“中和”、“太和”等观念和思想的推演，“阴化、阳化”翻译策略以易理为哲学依据，以十二消息卦作类比推出。策略与方法相辅相成，该书从“阴化、阳化”翻译策略又推演出“阴译、阳译”翻译方法。翻译中阴译和阳译互存互依，不可截然分割，理想的状态是“阴阳合德”、“阴阳和合”、“协调互补”。

“太和”不是一个玄虚的概念，作为一种翻译标准，它具有多种特性，包括整体性、多样性、审美性和动态性，符合且体现为语言的组合原则和格式塔效应。就审美性而言，“太和”是一种最本真、最理想的状态。和谐即美，由太和而推及审美是符合逻辑的，其拟构的太和审美包括语言审美、文化审美、情感审美等。《周易》所指的“太和”是阴与阳的完美统一，是一种变化之美，诚如《道德经》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审美是“神以明之”的玄妙，而《大易翻译学》给出了基于易理的解释，把它归结到生命，即审美本原：生命即美，生命是翻译的本原。在《周易》文化与美学审视中，“生”是易理的根本，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就翻译而言，“译有生生之美。”“生生”是翻译审美的前提，也是翻译审美的根本和理论基础。

该书还从《周易》移植了“言”、“象”、“意”这些概念，它们同样适用于翻译审美。比如，“象”是中国美学的逻辑起点。象之大美，在于摄“象”以尽“意”，即“立象尽意”。《周易》提出“立象以尽意”，把象看成表意的工具和桥梁，对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某种深邃隐秘的情思进行潜移默化的显示，以弥补“言不尽意”的遗憾。事实上，语言处于有限和无限、不尽意和尽意的悖论之中，而就译者而言，由于受到原文的制

约,其所面对的更多的是语言的局限性,而象本身则具有整体性、形象性、多义性,其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情趣和意蕴,能够弥补语言相关方面的不足,能够以小喻大、以少总多、以有限喻无限,从中体现了象征的意义,使其既具体又概括,既感性又抽象,使形而下之象能够表达形而上之道。

翻译涉及语言的运用,必须进行语言操作,虽说言不尽意,但必须言说,必须“译有所为”。美的创造需要“通变”/“变通”。翻译遵循《周易》的变革模式:穷—变—通—久—利/文。事物因穷而变,因变而通,因通而久,因久而得利/成文。

翻译的本体、原则、策略、方法等是基于翻译本身的考察,当然这些不是翻译的全部。该书也放眼文本之外论及翻译的外在因素。

《大易翻译学》利用《周易》的语言阐释了相关的翻译伦理:修辞立诚、利以合义、交通成和、以同而异和进德修业,这些内容大致涉及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和译者伦理。它们共存并依,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彼此割裂,单独看待。它认为,“修辞立诚”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伦理预设,是确保翻译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翻译既要讲翻译之“利”,又要讲翻译之“义”,应遵循“利以合义”的伦理标准。《周易》主张以同而异或说求同存异。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怀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和宽容的心态,遵循“以同而异”原则,顺应文化交流的本质,让不同文化各美其美,使它们在相互交流中彼此从对方获取营养,共同生长、发展和繁荣。

“画虎画皮难画骨”,“意态由来画不成”。风格的翻译虽然不无可能却是最为玄妙的东西。《大易翻译学》认为,译者风格与原作风格是翻译中风格运动的矛盾双方,而根据《周易》的模仿说,文本间的模仿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可以达致“阴阳合德”的状态。译者能与原作者产生情感的沟通,达到心灵的共鸣,翻译时两者的风格便易于融合,原作的“气韵”也易于传达,从而达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翻译风格的达成涉及翻译距离。由于时空距离、语言距离、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等客观存在,翻译距离不可避免。翻译是一种调和,它要“适当”,要“致中和”,因此正确调整翻译距离的原则和方法必不可少。该书根据《周易》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道理提出了“变通”/“通变”的翻译思想,而且依据《周易》的“穷—变—通—久—利/文”变革

模式提出了翻译的变通途径，即为取得最佳美学效果，译者调整翻译距离时应以“致中和”为终极目标，遵守“适旨、适性、适变、适度”的原则，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法，创造使人知之、乐之、好之的理想译文。

由于译即易，即变，而译的变是无穷尽的——变文之数无方，所以该书基于《周易》原理对于复译现象进行了解释。它认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处于未定状态，文本具有开放性，因此其解释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主体不同，理解不同，选择不同，翻译就不同。另外，对于历史上同一个作家、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不同时代的译者往往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异。前人有言：“易无达占，从变而移。”就是说，易卦没有固定的占断，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文无定诂，言人人殊，人以群分，言随时变……种种不确定因素决定了复译的必然性。

翻译批评是翻译的重要一环，但批评不是任意的，它与翻译的标准互为表里，所以该书提出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中和”是“中”与“和”的结合。“中”与“和”的关系可以说是体用关系或因果关系，事物因“中”而“和”，“中”是体，是“和”的前提，“和”是用，是“中”的结果。翻译批评应以“中和”为终极目标，“中和”可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中和”翻译批评标准的特性可以概括为：整体性、多元性和动态性。翻译批评方法在总体上呈现开放性系统的特性，不能只从一个方向、一个平面、一条直线上去研究。我们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不同侧面等进行相关研究。但无论怎样，翻译批评应不断朝着“中和”这一目标努力。从大易的视角着重研究翻译批评标准、原则和方法，可以说该书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通观全书，《大易翻译学》并不局限于文本而涉及与文本相关的因素，涵盖“科学学”所关注的范畴。翻译伴随翻译生态环境而生。这种视角有别于悬置法则，但有其合理性，因为生态和环境，犹如阴阳两种力量，相摩相荡，相生相克，交感成和，生生不息。翻译生态环境的“太和”状态是动态的，它随宏观环境因素、支持环境因素、作者因素、译者因素、读者因素等的变化而变化。此所谓“圆满调和”，即中国哲学上的“和合之境”或“太和之境”。

当然，任何理论都无法对翻译这个宇宙进化史上最为复杂的事件进行穷尽性的解释。《大易翻译学》可以看作一个总纲，具体的问题还需要专著来细化。

翻译处于悖论之中，既可以看作飞矢不动也可以看作万物皆流，那么其制约条件是什么呢？目前书中提到的标准是弹性的，还没有量化或难以量化，其操作性还有所欠缺，在此意义上作者还可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翻译的本原涉及翻译的本体论定位，而作者在此方面也着墨不多。其说明、描述的成分偏多，而解释、推导或推演的步骤等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简易”、“变易”、“不易”之间的关系，在翻译中如何体现如何操作等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就翻译批评而言，它着墨的重点是批评所涉及的伦理，似乎还缺少翻译批评的客观依据和理性的推导。

通观全书，其论述是系统而全面的，涉及翻译本体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标准与原则、翻译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

该书融易学与译学为一体，既弘易道又弘译道，是作者多年来从事译学、易学研究之结晶。翻译相对于道而言是用是器，而翻译学本身也具有翻译的本体论地位，在此意义上《大易翻译学》将翻译研究从对“器”的探究上升到了对“道”的求索。

综观之，《大易翻译学》以易治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途径，为中国传统译论灌注了新的血液。

赵彦春

2015年9月10日

于天津马场道

前 言

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翻译论著，包括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卡特福德（John Catford）、奈达（Eugene A. Nida）、纽马克（Peter Newmark）、斯坦纳（George Steiner）、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赖斯（Katharina Reiss）等一大批学者的论著，西方翻译理论在我国“大行其道”，一度将中国翻译理论推向边缘化状态。近十多年来，情况出现了明显变化，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创新。例如，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在《中国翻译》（第4期）上发表《翻译标准新说：和谐说》一文，开启和谐说翻译思想的传播历程。2001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论坛宣读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正式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日趋理性和成熟，催生了生态翻译学的形成。2011年，南京理工大学吴志杰教授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和《中国翻译》（第4期）上分别发表论文《中国传统译论研究的新方向：和合翻译学》和《和合翻译研究刍议》，提出了创立和合翻译学的设想，目前不少学者致力于和合翻译学的研究……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翻译，探讨新的翻译研究途径。但综观全局，现有国内翻译研究尚存一些不足，较为明显的是：在“器”上做文章者多，在“道”上探究者少。翻译理论要真正创新和彰显魅力，相关研究必须由“器”上升至“道”。而达至此“道”的良策莫过于将翻译的有关问题置于哲学的高度加以透视并进行系统研究。本书正是从这一策略出发，以《周易》的哲理为理论基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构建大易翻译学，综合研究一系列翻译问题，从而寻求有关翻译规律以指导翻译实践。

《周易》雄踞六经之首、三玄之冠，是“经典中之经典，哲学中之哲学，智慧中之智慧”（南怀瑾，2008：5）。它以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将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哲理结合，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形成了恍惚窈冥的象征哲学，闪现出人类智慧的灿烂光辉。《周易》因此历来备受关注，相关研究层出不穷。在国内，从古代的《易纬》、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朱熹《周易本义》、来知德《周易集注》、王夫之《周易外传》等到当代的李镜池《周易探源》，苏渊雷《易学会通》，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等，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著作虽涵盖“天地人三才”，但没有涉及翻译理论。在国外，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译介《周易》后，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87）、法国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834）、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82）、德国神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924）、加拿大汉学家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1994）、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1996）、英国汉学家闵福德（John Minford）（2014）等大批学者对《周易》进行了译介和研究，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杨平，2015）。然而，他们的研究路径大致为：（1）以传教士汉学为母体的宗教学路径；（2）以荣格（Carl Gustav Jung）为起点的分析心理学—比较文化学路径；（3）以考证和思辨为特征的历史—哲学路径；（4）结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易”路径（赵娟，2011）。这些国外易学研究者中没人从《周易》的视角系统研究翻译理论。

《易》准天地，弥纶大道，范围万化而无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断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转引自傅惠生、张善文，2008：42）在翻译研究史上，“援易以为说”可追溯至我国论述翻译的第一文——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该文提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支谦，2009：22）其中“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梁慧皎《高僧传》（卷第七）说，竺道生“彻悟言外”，视“忘筌取鱼”为译经大法（慧皎，1992：256）。这一说源自魏王弼对《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的发

挥：“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2011：414）清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援易以为说”甚为明显：“《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2009：202）其中“修辞立诚”源自《周易·文言传》。进入现当代，翻译研究受《周易》浸染越来越深。例如，许渊冲《译学与〈易经〉》（1992），钱纪芳《和合翻译思想初探》（2010），周朝伟《解蔽“翻译标准”》（2011），李丹、彭利元《从阴阳学说看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2011），魏建刚《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国传统译学之易学影响发微》（2015）等，皆援易入译，利用《周易》的智慧阐释有关翻译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些译论在整个翻译研究中仅是凤毛麟角，只能算零星“散论”，不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缺乏系统性。相对于辉煌灿烂的《周易》文化，翻译研究中映现的《周易》身影何其少！因此，在当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加强援易入译的研究工作极为必要且意义重大。为顺应时代的潮流，笔者致力于易学与译学研究，将两者融合构建大易翻译学并撰写了专著《大易翻译学》。此书并非简单零散地援易入译，而是较深入系统地以易治译，力图以易弘译。

世界是一个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系统，文化是一个系统，大易翻译学也是一个系统，他们分别实现自己的太极建构。就大易翻译学而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元素，而是一个成分多样的复杂的太极建构，其研究范围不囿于一隅，研究内容不拘于一端。总的说来，《大易翻译学》以《周易》文本和文化、翻译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将易学和译学融为一体，创立新的翻译研究话语体系。全书共十三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大易翻译学的哲学依据、翻译含义与本质、翻译标准与策略、翻译原则与方法、翻译审美（包括审美本原、审美表现、审美态度、审美境界、审美理想）、翻译伦理（包括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存异伦理、译者伦理）、翻译风格（包括风格的可译性、翻译风格与译者个性的关系、译者风格与原文风格的统一）、翻译距离（包括翻译距离的成因、翻译距离调整的原则与方法）、复译（包括复译原因与策略）、翻译批评（包括翻译批评标准、原则与方法）、翻译生态环境（包括翻译生态环境的特性、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理想状态）等。